



袖珍经典

信任

[德] 尼克拉斯·卢曼 著 瞿铁鹏 李强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德] 尼克拉斯·卢曼 著 瞿铁鹏 李 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德]卢曼著；
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5037-6

I. 信... II. ①卢...②瞿...③李... III. 社会问题—研究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21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周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德]尼克拉斯·卢曼 著
瞿铁鹏 李强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787×965 毫米 1/32
印张 5.125
插页 4
字数 119,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037-6/B·416
定价 15.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 | | | | | |
|-----|-----|-----|-----|-----|-----|
| 丁荣生 | 王一方 | 王为松 | 王兴康 | 包南麟 | 叶 路 |
| 张晓敏 | 张跃进 | 李伟国 | 李远涛 | 李梦生 | 陈 和 |
| 陈 昕 | 郁椿德 | 金良年 | 施宏俊 | 胡大卫 | 赵月瑟 |
| 赵昌平 | 翁经义 | 郭志坤 | 曹维劲 | 渠敬东 | 潘 涛 |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 | |
|---------------------------|-----|
| 序言 | 1 |
| 第一章 问题的界定：社会复杂性 | 3 |
| 第二章 状态与事件 | 12 |
| 第三章 熟悉与信任 | 23 |
| 第四章 信任：复杂性简化 | 30 |
| 第五章 透支信息与制裁的可能性 | 41 |
| 第六章 人格信任 | 50 |
| 第七章 交往媒介与系统信任 | 62 |
| 第八章 策略概念：作为机会与作为制约的 信任 | 80 |
| 第九章 对信任的信任 | 86 |
| 第十章 信任与不信任 | 93 |
| 第十一章 信任的准备 | 102 |

第十二章 信任与不信任的合理性_____ 113**参考文献**_____ 126**索引**_____ 144

序 言

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有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应用日常语言惯用的术语和来自伦理学传统讨论领域的概念是否可取？道德说教改成社会学概念，似乎利弊参半，不过它们也可能变得明显失衡。如果我们仍处在批判破除和脱离所有预先假设的水平，通过提供因果说明或证明隐蔽的附带目的来揭露意识形态信仰，那么其弊端就占据上风。这一术语独特的效用就会丧失，其传统意义视域也会贬值。在目前思想氛围内，这是一个很好耍的花招——也许太容易了，因为社会学从中可以学会某种东西，由此构成某种理论的应用。另一方面，如果社会学超出这一水平，通过建构它自己的理论，积极地确立其实证地位，因而与社会世界的日常理解及其在伦理话语中的说法展开对话，那么特定日常用语的长处可能大大超过它的短处。在此意义上，以下对信任这一概念的思考旨在为社会学理论做出贡献。

在多特蒙德明斯特大学社会研究所，我着手这份手稿

的写作。当时有关信任的论述相当有力地吸引了我，今天它还远没有方法论上令人信服的证明。与 H-J. 科尼贝博士、F. X. 考夫曼博士的具体讨论极大地激励了我，而且使我的下述观点更为坚定：理论与经验工作的鸿沟虽不可避免，但并非不可跨越。

尼克拉斯·卢曼

1967—1968 年冬于多特蒙德

第一章

问题的界定：社会复杂性 1

在其最广泛的涵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某人可以在某些方面选择是否给予信任。但是，若完全没有信任的话，他甚至会次日早晨卧床不起。他将会深受一种模糊的恐惧感折磨，为平息这种恐惧而苦恼。他甚至不能够形成确切的不信任，并使之成为各种预防措施的基础，因为这又会在其他方向上预先假定了信任。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在其最极端情况下，这种与世界复杂性的突然遭遇超出了人的承受力。

我们可以把这一出发点看作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容置疑的真命题。每一天，我们都把信任作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1]。在这个最基本的层次上，信心（Zutrauen）是世界的自然特征，是我们借以过日常生活的视

[1] 这一概念不断重复出现在少得可怜的以信任为主题的文献中。参见E. Diesel (1974), 21ff.

域的必要部分，但它不是意向中的(因而是易变的)经验的构成因素。

第二，我们可以把信任的必要性看作是正确行为规则产生的真实和确凿的根据。如果混乱和平息恐惧是信任的惟一抉择，那么就其本质而言，人不得不付出信任，尽管这不是盲目付出的，而只是在一定方向上付出的。^[1]借这种方法，人们得到伦理法则或自然法则——一些本质上可逆转为反面的、其适用性有待商榷的原则。

第三个可能性是，去设想并利用想像力把那种没有信任的实存的焦虑描绘出来。依此方式，你可以超越日常世界，通过哲学传统疏远日常世界的解释。对这种局限处境的洞察力，使心理学家和医生入迷，^[2]更不用说现代著名的思想者了。其实，尽管令人头晕目眩的观念有其用处，也可能有教益，但它们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功能主义研究，在许多不同的方面近似于这种实存哲学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它对实体原则的拒斥，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得不那么小心谨慎地避开这些哲学取向的原因。^[3]因为功能主义的特征在于它独特的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既然这些独特之处是有争议的，^[4]那

[1] 参见, N. Hartmann (1962), 468ff., B. Bauch(1938), 67-74; F. Darnstaeder(1948), 430-436 (433), H.Eichler(1950), 111ff, G. Stratenwerth(1958), 78ff. 正如施特拉滕韦特在他讨论中指出的, 只有一个人假设了一套普遍存在的价值体系, 明确指明在哪里“是”变成“但是”, 这种“是/但是”的争论才是有意义的。

[2] 参见A. Nitschke (1952), 175-180.

[3] 马塞尔对问题(“problème”)和奥秘(“mystère”)的二分法, 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尽管尚不充分的取向, 参见, G. Marcel (1935), 162ff. 对于先验现象学以及功能分析的目的来说, 这一取向是无用的, 因为它将问题的概念指向了生产和占有的问题。这里的“生产”和“占有”主要作为一种密码, 代表自我与世界的一种高度抽象的基本关系, 前者代表独立变化的关系, 后者代表相对不变的关系。

[4] 参见K. Davis (1959), 757-772, 他试图混合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 这给人以具有广泛说服力的印象。

么我们就必须在审视信任的功能之前关注一下它的基本特征。^[1]

功能分析并非是在确定的数据和可靠的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并以此获得进一步的知识；它最终与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有关。因此，方法既不是演绎的，也不是归纳的，而是在相当特殊的意义上是启发式的（heuristisch）。问题是从维持行动系统持续存在的角度提出来的——或者更抽象地说：现实世界的认同问题。此外，定义也不再被视为本质或不变性问题，相反，它会被视为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从在其他可能性的框架中的特定位置得到其意义，而不是从某些假定的、不变的本质属性中获取其意义。这种或那种认同的“本质”，是由可能取代它的其他认同的条件界定的。给定这种研究方式，那么功能分析的研究过程就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它应对复杂性的潜力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许多不同的特征表明从所有方面应付复杂性的巨大能力，这种能力不见于那种应用社会团结甚或凝聚力^[2]

3

[1] 详见N. Luhmann (1971), 9ff., 31ff.。

[2] 这些不同的特征包括以下方面：

- (a) 所有的功能表达与特殊的行为系统相关才是有效的，而系统的数目是庞大的；
- (b) 一个单独的行为可以属于几种系统，因此系统可能以非常复杂的方式互相联系；
- (c) 对于系统的功能分析，不仅试图揭示显性功能（有意识的行为目的），而且也特别重视隐性功能；
- (d) 功能分析在考虑行为的功能性结果的同时，也考虑行为的不良功能，并将后者作为进一步分析的起点；
- (e) 它是一种比较方法，其先决条件是拒绝日常生活中先验的（Vorbedingung）类似与比较关系，通过把对类似性的判断从对象转移到功能，这种方法表明，最异质的现象，从特殊结果的观点看，是功能等价的。

从整体上看，这些特征表明，功能方法，由于研究处在单纯兴趣和目的之外或之下的东西，因而原则上超越了行动视角的局限，而且达到较大的复杂性。

等基本思想的、日常的或传统的对世界的理解。

然而，复杂性以及处理复杂性的能力，并不只是功能方法的整个构思定向之后的统一目的和隐藏动机；它同时还是功能研究的最基本的实质性问题。只有从其最大的复杂性的立场出发，整体性世界问题、所有人类经验的普遍视域问题才值得攻击。^[1] 由于它没有边界，因而并不是一个系统，没有什么是在外在于它的，它不会受到威胁。即使其能量形式的彻底改变也只能被解释为内部事件。确实产生的惟一问题是，整体世界与个人在世间认同的关系，这一问题表现为时空复杂性的增加，表现为它的现实与它的可能性的无法想像的丰富。这阻碍了个人对世界的成功调适，因为从内部来看，世界表现为无法对付的复杂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各系统努力在世界上维持自身的问题。

将复杂性视为基本问题的第二个好处是：其高度的抽象性和一致性模糊了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类别差异，因而抹杀了心理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区别。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以及科学研究，我们知道，表现信任的意愿
4 依赖于心理的系统结构，比如用 F 量表^[2] 测量出来的心理结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确定，纯粹的心理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完全不同的根据促使人们给予或拒绝信任^[3]，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

[1] 关于这种现象学的世界观，详见 E. Husserl (1948), 23ff., 及 (1954), 105ff.; L. Landgrebe (1940); G. Brand, (1955), 13ff.; E. Fink (1958); J. Bednarski (1957), 419ff.; H. Hohl (1962) 的评论。

[2] 参见 M. Deutsch (1960b)。这种研究的可靠性和其他方法论问题，及其可质疑的人格变量的几乎同义反复的措词选择，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详见于 Wrightsman (1966)。

[3] 依照 M. Deutsch (1962, 303) 的说法，“一种信任的选择也许是基于‘失望’，‘附和’，‘冲动’，‘清白’，‘美德’，‘信念’，‘受虐狂’，或者‘自信’”，尽管这种多样性的概念是相当粗糙的。社会心理学事实上总在

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信任在互动框架中产生，互动既受心理影响，也受社会系统影响，而且不可能排他地与任何单方面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躲进比较一般的理论语言之中，在这里，诸如系统、环境、功能和复杂性等概念在高度抽象水平上阐述出来，以便既适合于心理学又适于社会学的阐释。塔科特·帕森斯也走出了同样的路，尽管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更加确切地说，走向结构的、一般“行动系统”的理论。^[1]

因此，复杂性概念要以非常抽象的术语来定义。我们可以直接根据系统与环境的区别，而且根据系统现实化的潜力做到这一点。因而这一概念意指，通过系统形态开放的一系列可能性。^[2]这暗示着，可能性的条件(从而边界)是可以指明的，世界就那样构成了，同时，世界包含的可能性，超出可能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从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与系统的这种关系可看作是一个超载的、不断受到威胁的不稳定性问题。事实上，这是功能主义的系统理论的研究方式。从相反的视角看，同样的处境表现为一种“较高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构成，是通过在世界中系统的形成而减少复杂性，这又提出了一个选择效率的问题。后一种研究方式是控制论系统理论的思考方法。

试图把社会范围还原为个人心理变量 [参见M. Deutsch (1962), 306ff.],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可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些事实的原因。社会系统理论的初级课程之一就是：极其不同的心理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在功能方面可能是等价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系统可以摆脱个人的心理过程。

[1] 关于社会心理学以还原论方式利用个人心理学，最近的介绍和争论，见T. Parsons (1970)。

[2] 因此复杂性的概念可以与欧洲古典哲学的实体概念相比较。但是当时，“实体”在概念上与“形式”有关，而复杂性概念则以选择手段简化的系统为先决条件。

世界上每一种实在的系统，无论是由物理单元或生理单元构成的，是由石头、植物构成的，还是由动物构成的，对它来说，世界都是极度复杂的。世界的可能性超出系统对其反应能力所及的范围。一个系统在选择性构成的“环境”中确立自己，而且将在环境与“世界”的脱离情况下瓦解。然而，人类，而且只有他们，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因而意识到选择其环境的可能性，因而提出自我保存的基本问题。人类具有理解世界的能力，能够看到各种替代选择、各种可能性，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必须做出决定的那个人。这种世界略图和个人的意识，对于他自己系统的结构和行为基础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他能够体验其他的人，而就那些他人而论，他们同时也正体验到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可能性的东西，那些人正在为他传递世界，正在把他看作对象，而且通过采纳他人的观点，这使他有可能确认他自己。

因此，以这种方式展示世界，而且在世界中分辨意义和自我的存在，是惟一可能的，因为我们求助于一个全新的复杂性维度，即我们体验和理解的其他人主体的“类我性” (Ichhaftigkeit)。由于其他人有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第一手进入，而且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事情，他们也许因而成为我的根本不安全的根源。除了大量的不同种类的实在对象和在时间历程内它们丰富的多样性之外，世界的复杂性通过这一社会维度进一步提高了，这一社会维度并非简单地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而是作为另一个自我 (andere Ich) 浮现在人的意识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加需要简化复杂性的新机制——当然，首先需要语言和反思的自我意识作为普泛化和选择性的机制。

- 6 在目前，人们还没有给出在人们自己的世界中他我 (alterego) 事实存在的具有说服力的哲学解释，他我除非

主体间性地构成，否则是无法想像的，即使在基本围绕那个问题展开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框架当中也没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1]就人未被简单地忽略而言，科学以不同方式研究不同种类人的不可预见性；这被视为一个难题，如何解释各种秩序安排的功能。托马斯·霍布斯致力于确立绝对政治统治的必要条件，其根源在此难题，尽管通过把复杂性难题解释为法律和秩序的问题，他达到绝对统治的结论，这使他对其他选择视而不见。阿尔弗雷德·舒茨阐述的胡塞尔理论：主体间调适的经验可能性的典型化，就有这种不可计算的复杂性背景，这种复杂性植根于他我在世界中在场，而且必须被简化为各种共同的类型。同样，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也建基于同样的基本观点；在他的所有互动的“双重偶然性 (double contingency)”概念中，人们可以看到，倘若存在角色期待的互补性，那么规则的形成就是必要的。^[2]受经济学家启发的当代组织理论也作了同样的考虑，因此致力于超越仅仅把个人效用功能整合在一起的功利主义尝试。^[3]所有这些观念可

[1] 详见于E. Husserl (1952), 190ff.; (1954), 185ff., 415ff. 及各处。胡塞尔的局限性体现在：它断言在先验主观主义意义上的我的主体性的先在性，而且在此基础上试图理解他人的构成，即主体间的经验共同体和在主体视域内领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思考的出发点，只能一步步地通过方法论的抽象过程来获得，胡塞尔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还原”。在这一方面，胡塞尔本人也陷入了同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绝对静态的功能主义，一方面又不得不提出一种人为孤立出来的基本视角。所有逃避这一两难处境的努力，直接从它出发，再回到已经建立的世界，因而无法解决胡塞尔的问题。详见A. Schutz (1932)，特别是p. 186，以及一些收在A. Schutz (3卷, 1962-1966) 中后来的文章。关于进一步对胡塞尔的批判见：A. Schutz (1957), J. P. Sartre (1950), 273ff., M. Merleau-Ponty (1945), 398ff.; W. E. Hocking (1953/54), 451ff.; L. Landgrebe (1963), 89ff., and M. Theunissen (1965)。

[2] 明确的表述，参看T. Parsons, E. A. Shils (1951), 16；也见T. Parsons (1951), 10ff.；及A. W. Gouldner (1959及1960)。

[3] 一方面，这符合西蒙的有关人类的不充分能力的观点——而且这是复杂性问题的镜像反映——取得对做决策组织的功能把握，详见于H. A. Simon (1955及1957b)；另一方面，这也符合受博弈论启发的组织理论的尝